

一八九四年穗港地區的鼠疫流行與扶鸞的乩示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文學部教授 志賀市子

前言

於省港澳地區的道堂運動興起以及其發展歷史當中，1894年（光緒20年）可以說是一個劃時代的年頭¹。

正如許多研究指出，1894年春襲擊香港、廣州的鼠疫大流行，令人們陷入恐怖的深淵，引起了各種各樣的社會現象。當時，人們對鼠疫的認識還很膚淺。香港瘟疫爆發和蔓延後，根據細菌學者和醫生的調查和研究結果，才查明到鼠疫是由鼠疫菌引起的傳染病。當然，當時未能達到對鼠疫有效的抗生物質開發的階段，檢疫體制也不充分。

當時，在香港、廣州創立的東華醫院、愛育善堂等民間善堂，積極參與收容和治療病人、處理和埋葬屍體等活動，對控制鼠疫流行起了一定的作用，同時以致力於抵抗疫病為契機，不斷創立新的善堂。例如廣州的九大善堂之一方便醫院的前身，便是1894年鼠疫流行時所設立的收容傳染病患者的設施「方便所」²。

然而，在那種情況下，人們最熱衷於實行的是「求神庇護」。顧文、李永宸所著的《嶺南瘟疫史》也指出，「猝然而到屠城大疫，茫然無助的廣州民眾最普遍的自發行為就是求神庇佑，迎神賽會等事幾乎無日無地不有，不惜以有用之資財，擲之於無益之地，而延醫製藥以盡人事者，則屈指可數。」³迎神賽會，也叫「巡遊清疫」，以聚集地區神廟坊眾，抬神像於社區內出遊，驅除疫氣的一種儀式。愛育善堂的董事也出資，在廣州城內舉行了城隍神的巡遊⁴。「巡遊清疫」與施藥施棺一樣，是官方和善堂應該負責的重要救濟活動之一。

雖然《嶺南瘟疫史》裏所指的「延醫製藥以盡人事者，則屈指可數」，但在傳統社會裏，對神仙祈願和延醫製藥並不存在矛盾的。依靠神仙的力量，按照神仙開示的處方（所謂「神方」、「仙方」）來延醫製藥是很普遍的。在瘟疫流行時，為得到神仙的聖訓和處方，除了善堂、廟之外，以至宗族的祠堂、會館、書院、藥署等公共機關，人們到處舉行扶鸞儀式，把一絲的希望寄託於神方。

在瘟疫流行時誕生的小規模扶鸞集團之中，瘟疫平息之後也繼續扶鸞，遵從神仙的乩示，逐漸擴充成員和堅持定期的活動，終於走向設立道堂的階段。本文將介紹有關在1894年鼠疫流行時，在道堂的扶鸞儀式上所降示的乩文，從中探討和理解疫病觀、勸災觀以及神仙所降示的藥方的效果。

在香港流傳的關帝乩示

1894年春，在香港鼠疫流行之際，不知從哪裏，傳佈了稱為關帝乩文的傳單。究竟這張乩文裏寫了些什麼內容呢？本文將從De Groot著《中國的宗教制度》⁵和香港政廳的報告⁶，詳細地討論其內容。

傳單裏所寫的是，農曆3月5日在某個善堂裏，關聖帝君分5次降壇，傳授了符、詩以及藥方。

在第一次乩示裏，描繪了一些像魚或蜥蜴的形象，正如小孩子淘氣畫的沒有意思的圖案（見圖1）。第二次的乩示裏，在圖中有像蚯蚓爬行的草體文字圖案上還添附「修理儒部事務關某自用之寶」的說明（見圖2）。第三次乩示，也用了像蚯蚓爬行的草體文字寫了「剛毅精明、不贊自見」（見圖3）。第四次的乩示，即是關帝自報「吾乃大漢關某」的聖訓。以下引用全文：

「吾乃大漢關某，諭爾求藥人等。若叩民間時事，須知虛序不平。更且附城煤地，燒毒久惡匪輕，汝等開常無禮，急時備供講經。在數難逃數內，縱有符藥何靈。汝說粵垣是劫，東西兩魯尤驚，荊州與同直隸，各處已有先聲，何乃仍無悔改。今數不差毫等，一是本當盡盡，二為增谷法懲。目下十一二，末期了此災徵，本屬天機莫測。惟情保赤眾生，莫若依吾一事，吾定親力親行，看我從前臨事，到處鬼怕神歎。堪惜善念未舉，先自宰殺奉神，多費紙錢香燭，豈云免疾再生。立早百前悔改，對天盟誓一經，誰不知吾成願。心口兩莫欺生，盟誓後一善舉，當立證據休輕。或表吾堂有據，或請我經依經，心果不欺關某，誦經十日必靈，關某親現形跡，方信某有威靈。」⁷

參考De Groot和香港政廳報告的譯文則歸納為：「今年因日月運行不順，燥毒蔓延，不能逃脫注定的命運。如想擺脫疫病，勿忙心煩、宰殺奉神、焚香燒紙，終歸是徒勞無益。如想免病延生的話，立刻在我（關帝）面前悔改，向青天發誓施



圖1

一善舉。或作為善舉的證據，念我之經十天，誓必靈驗，且我關帝也會降臨。」

善書救劫的主題

第五次的亂示是關帝敘述的長篇散文。有關這部分的原文，因為 De Groot 的著書和香港政廳的報告裏都沒有記載，這裏只把 De Groot 的英譯要點記述如下：

「農曆三月廿四日，我（關帝）在天宮門前，正好碰上正要降下人間的火神、風神和太白金星。我驚問，對諸諸惡業的人類所激怒的玉皇，命令三位神到人間，將河水泥濘，傳播疫病，把人類之數目減少到一半。關帝隨即向玉皇懇願，給予半年的緩期。為此，玉皇任命關帝為瘟疫部門的負責人，並命令派遣「功過格」的審查官一百人、生前清廉潔白的官僚鬼數人，以及浮游於冥界的鬼卒千人到人間，調查惡人。瘟疫不准孝順及愛人家之門，而有惡人之家則毫無顧忌地立刻進駐。在這裏不能遺忘的是，災禍是上天遣降的，我也不能抵擋。如無視我的警告者，則會犧牲於瘟疫，或者被我的臣下周會所斬殺。無論是犧牲或是禮拜都不能把我收買的。如要求得我的庇護，則需念我之經，虔誠積德。如不會誦讀經文的婦女，只要朝夕焚香即可。……」

以上之亂文內容，正如「疫病是上天遣降，鬼神作祟」，「無德招禍，有德免災」，反映了融合天人相親和因果報應的中國傳統疫病觀。

這篇亂文的內容，是清末各地善堂和宗教結社所編的叫《救劫經》或《救世經》的善書裏屢次提到的中心主題。台灣的歷史研究者范純武氏，分析了從道光到光緒年間北京、四川、雲南等地所著的善書數十冊內容的結果，指出所謂「三相代天宣化」的主題頻繁出現。「三相代天宣化」是指，關聖帝君、呂祖、文昌帝君的三位宰相，向被人心荒廢而激怒的玉皇大帝懇願，採納了扶鸞的手段，代天宣化，勸人行善，人類才能避脫劫難的故事。

「三相代天宣化」的故事，「庚子之劫」（把庚子年看作是浩劫降臨之年的終末戰）將會降臨的道光庚子年（1840年）以來，一直被廣泛流傳。在清末廣東流通的善書裏，也同樣可以見到這一主題。例如，光緒17年（1891年），在廣東高州府信宜城的二帝宮裏，據文昌帝君降筆而著的《文昌帝君救劫保生經》，有如下這一章記載：

「罪孽滔天。腥滿天地。水陸盡乎東海。莫濯其污。竹箴響西山。雞其惡。玉皇震怒。群聖生嗔。鬱結薄空。妖魔恣世。校察圖錄。運合衝霄。更變生人。劫將一轉。……四方塗孽。兵戈迭起。骸骨成山。疫癘頻仍。……吾目民艱。關心世亂。深憫蚩蚩黎庶。吾求赫赫玉皇。開方便之門。廣子再生之路。偕同關帝呂二帝。跪奏通明七天。懇竭斯誠。准如所請。不辭勞瘁。疊為提衝。復誓晨鐘。重搗暮鼓。慈航再渡。望彼輩早出迷津。……」

即是說，人類所犯的罪業

激怒了玉皇大帝，導致上天遣降各種各樣的災劫。看到受盡痛苦折磨而猶豫不安的民眾，文帝（文昌帝君）偕同關聖帝君和呂祖二帝，在玉皇大帝的面前跪奏七天，懇願息怒，給予再生之路。

貫穿「善功可化劫」思想的救劫善書，作為有效的避劫手段，提倡不僅是個人積善，而且實踐組織性的積善，即是設立善堂和捐款於善堂。1894年在香港流傳的關帝亂文之「表善堂有據」這些語句，正是在這種背景而出現的。

扶鸞所亂示的藥方

關帝在第五次的亂示之後，為防疫鬼進家，建議在門口張貼「協理瘟部事務關帝在此」的十個文字和有刺的圖案，最後還開列外治法和煎熬藥草的處方。

外治法是對帶有腺鼠疫特徵症狀的淋巴結嚴重腫脹時所採用的治療法。用銀針刺入腫處，把裏面的毒血取出來，因為如果黑色毒血浸入肺部，將會導致危險。用水把帶來的芽孢煮至粘糊狀後飲用，有助消炎解毒。如鼠疫侵入肺部的話，則讓患者由鼻子吸進藥粉。

湯藥則是發高熱而且淋巴結腫脹時採用的處方。以17種藥草（管仲、牛勞子、山枝子、連翹、辨身、防風、雲苓、甘草、蒼朮、川連、檳榔、木香、藜蘆、厚樸、法夏、牽茅、薑根）煎製而成。

因為筆者不是中國醫藥的專業，所以不能正確判斷該方的功效。根據《中藥大辭典》，查其中幾種藥材的功能如下（括弧內是正式藥名或異名）：管仲能解熱消炎、止血；牛勞子（牛勞子）能疏散風熱、治癰腫疔毒；山枝子能清熱、止瀉；連翹能清熱、解毒、散結、消腫和治療癰疽、癰癤疔毒；雲苓（雲南茯苓）能健脾祛濕；甘草有解毒、補血的作用；蒼朮能健脾燥濕；川連（四川黃連）有效於治療性感染；檳榔和木香一起服用能散胎中邪氣；藜蘆（扁柏、側柏葉）能止血、散毒；厚樸（厚朴）能消痰；法夏（法製半夏）可以止咳化痰；牽茅（牽子）有效於壯胃；薑根能清熱。

以上據「神方」的藥味和其藥效所知，絕對不是只把藥名隨便列下來，可以看出是根據緩和鼠疫各樣的症狀而開示的藥方。或許，扶鸞開這藥方的亂手，是具有專業性中藥知識的人士。

亂示中還記載，只要有一個人出資把這份傳單印發二十份，那個人就能避免瘟疫，如果印發二百份，則其全家能避免其感染，或許當時在香港與廣東地區散發了相當多的傳單，其中數份偶然到了西洋人的手上，因此今天我們能目睹這份關帝亂文吧！

廣州鼠疫流行和省躬草堂的創立

據《嶺南瘟疫史》說，1894年香港的鼠疫流行集中於農曆4至6月，而流行高峰在農曆5月（西曆6月）。廣州早



圖3



圖2

於香港1個月，爆發流行於農曆2月底起，至農曆6月才漸趨平息，而郊區、鄉村轉盛¹。從此可見，農曆3月5日的上述關帝乩文，或許不是在香港的道堂降示的，而很有可能在廣州的某一間道堂降示的。

廣州的疫情比香港還嚴重，死亡人數一說達到7萬或10萬。當時到處都有求神庇佑、迎神賽會、扶乩儀式等活動。現存香港大埔的省躬草堂之創立也是以那時候的扶乩儀式為開端的²。

省躬草堂編輯的善書《省躬錄》裏有描寫當時扶乩儀式的情況：從1894年4月21日起，陷於惶恐不安的民眾都聚集在親東番禺縣公署的後院，開始扶乩。22日晚上郭大仙、張大仙、曾大仙三位仙師陸續降壇。人們問：「時疫盛行，求賜靈符服食療治，佩帶鎮宅，可否恩准施行？」曾仙師回答說，「吾袖中一算，知十二家子弟中，有廣成子道長意欲下凡濟世，各子明晚誠心虔請，或可感降，俟之。」第二天晚上，人們再次匯集在縣公署後院，又舉行扶乩，等待廣成子降壇。經幾次試行後，終於廣成子與友人的仙師們一起降壇，宣言，「吾乃玉虛宮門下成童廣成子是也。適承友命降壇，以決眾疑，諸弟子誠心問事，無不應驗，不誠騙之，污穢迷之，勿謂言之不預，各宜自重。」人們求廣仙師賜治疫靈符。廣仙師回答：「嗟嘆，今年世人大半斃，善者免，惡難逃，逃過劫，非不可善符，俟吾算之何如，存心，取筆紙來，書治病符式一張，各子習之。」（《省躬錄》初集卷1，頁2-3）

《省躬錄》第2集裏所收錄的《靈驗證記》，是編輯廣仙師降示的符和藥方靈應語言的報告，其中有一位名叫潘琦光的信徒到場參加扶乩儀式。他自述：

「是年夏間，羊城瘟疫流行，時余家居城內古慶里。此街疫氣尤盛，目擊心傷。余與同志虔請扶乩，即求符藥，竊效傳送。四月念三日，眾聚廣祖師降壇，教符濟世。余以本街疫盛，即問可否遷居，乩示曰，疫神不入爾家，且爾故父常回保護，故得平安，有惡勿作云云。余於是則不遷居，闔家皆幸無恙。……」（《省躬錄》初集卷2，〈靈驗證記〉，頁9）

《省躬錄》裏也有「緣本年（1896年）正月朔六日，玉皇命瘟神下降四處，各子覓食四方，誠恐染此毒氣……」的一節，顯示疫病的流行就是由於憤怒的玉皇把疫神逼下去而發生的疫病觀。

廣仙師第一次降示的是「治百病驅毒符」一式。關於其靈效，在《靈驗證記》中，有一位信徒述：

「甲午夏疫癘盛行，羊城尤甚。每每身起毒核，朝發夕亡。都人士咸有成心，奉夏既望。余自隕回（番禺縣）管省，是夕宿於番禺公署，獨初下，靜上忽生一核，刺痛不堪，頭眩眼花，遍身如火，杯弓蛇影，備極慘狀，惟是時之患核症者，百藥無靈，請醫之術。於是眾謀解教，無可應援。忽憶舊年新請廣仙師降壇，教符救疫。亟往求符化服，服後略為安靜，竟沉沉睡去，直至斗轉參橫，方覺清醒，醒後遍體清涼，其核已失，若不知是夕之曾患毒核也者，是誠驗之速且奇也。其靈驗為何如哉。」（《省躬錄》初集卷2，〈靈驗證記〉，頁10-11）。在此所說的「毒核」是指淋巴結腫大。

廣仙師在扶乩儀式不但降示治病符而且開藥方。對鼠疫降示的藥方如下：「黃耆二錢半、銀花三錢、連翹二錢、錦軍三錢、夜下、枳實二錢、露瀉二錢、花粉三錢、正厚犀角錢半、先煎，重者則用二錢，甘草一錢，加白芍四錢為引。外治之法、宜其藥者及即見功、方能有效。用本堂內之玉繡球葉搗爛，和黃糖敷之，加正川椒香四分，無力者，或以大梅片五分換之亦可」（初集，卷2，頁27-28）。³

據《中藥大辭典》各個藥味的藥效如下：黃耆、犀角、銀花、雲連（雲南黃連）都有清熱解毒的作用，錦軍（錦雞椒）有瀉下和消炎的效用。

外治之法是寫核病的處方。玉繡球葉具有消腫止痛作用。梅片，別名叫冰片或龍腦，也有消腫止痛作用。麝香能治惡瘡癰漏腫痛。

從這些藥味的處方窺見，開省躬草堂仙方的人（即是扶乩亂手），不是外行，很有可能是醫藥知識相當豐富的專家⁴。跟上述的開帝神方一樣，道堂開示的神方、仙方，無論內科和外科都有緩和鼠疫症狀的實際效果。

小結

總之，有宗教性的疫病觀和有科學性的藥方共存是道堂醫療的一個特徵。現代香港的道堂正繼承了這一特徵。到了現代，道堂的科學性醫療活動，發展成中醫西醫的診所或藥局。那麼，發展到近代化的過程中，道堂的宗教性醫療活動是否被視為迷信而淘汰的呢？否。扶乩、畫符、仙水、符水、藥簽等宗教性醫療活動還是盛行。在科學昌明的現代也還是存在勸人修善而避免災劫的觀念。

道堂醫療的這個特徵很明顯地看出在2003年春天SARS流行之際道堂所實行的諸項活動。例如，2003年4月香港道教聯合會聯同16間道堂舉行「消災解厄祈福法會」，傳送瘟神的儀式⁵。此外，在香港某個道堂的網站上記載了對SARS的治病符、藥方以及如下的乩示：「善可化劫，惡可消災」。

可以說，19世紀末興起的道堂之傳統思想，仍活在21世紀的道堂。

- 1 詳參本人《近代中國的シャーマニズムと道教——香港の道壇と扶乩儀》（東京：研文出版，1999）。
- 2 吳元浩之《香港傳統醫藥之機展覽ネットワーク》。載於黃嘉強編《華僑、華人研究與發展》（東京：汲古書院，1999），頁262-283。
- 3 陳文、李永宏《嶺南道史》，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004，頁366。
- 4 廣東省檔案館《申報》廣東史料選編增補卷《申報》廣東史料選編續編170-184頁，130頁。另外，關於清末對鼠疫流行之際的官方與民間社會的反應，詳參《傳染病史》以及Carol Benedict, *S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alifornia*,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15-126。
- 5 De Groot, J.J.M.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Paperiet (Taipei: Cheng Wen Publishing Co., 1980-1910)1976ff, pp.1304-1306.
- 6 Dyer Ball, "A Chinese View of Plague," in Hong Kong Legislative Council Paper, edited by Hong Kong Government,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05).
- 7 De Groot, J.J.M. *Religious System of China*, p.1304.
- 8 陳文、李永宏《嶺南道史》，頁366。
- 9 在台灣一般稱為「解堂」的扶乩儀式裏，供奉分應天宮玄壇神的三位神祇是三皇主。但三皇主的組合各堂堂不一，有些堂堂供奉司命真君和民間社會的善君，有些堂堂又供奉玄天上帝和玉皇上帝而為五皇主。
- 10 呂紹武《清末民間醫藥事業與靈驗堂研究》（台北：國立中正大學歷史研究所，1996）請文論，頁116-118。
- 11 小學館編《中藥大辭典》（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5）。
- 12 陳文、李永宏《嶺南道史》，頁305。
- 13 關於道堂醫藥的學理研究，詳參本人《近代道壇的道堂——何府聖醫的醫學事業及其靈應研究》，李志宏主編《香港及粵海關道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05），頁307-333。
- 14 有關正統的學名和真藥效，想無疑以中醫藥學為專長的淡城大學高師院該院的研究者，另一位即是參閱《中藥大辭典》。
- 15 據黃嘉強教授的指出，省躬聖藥的處方，是晚清代中醫藥學的平均水平所組成。遠未達到神效的藥學和藥劑學。關於藥味，從生藥的利用到炮製都有詳細的指示。說明學理和藥劑學上所配方的，不如說是在藥房透過藥劑師的處方而學師的士人所配方更為妥當。
- 16 詳參潘子雲《香港道壇法儀祈福法會及其祈禱文》，《華僑研究資料中心通訊》第32期，2003，頁21-26。

首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

引言

為了推動中國道教界培訓領導人材的工作，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和蓬瀛仙館於本年7月合辦第一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以下為是次課程簡介及三位修畢課程的學員感言。

2006「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課程大綱

課堂講學

1. 現代管理學（一）：組織行為學（2006年7月11日）
2. 現代管理學（二）：人力資源管理（2006年7月11日）
3. 現代管理學（三）：領導學（2006年7月12日）
4. 文物管理（一）：文物的修復與保護（2006年7月12日）
5. 文物管理（二）：文物的管理與展示（2006年7月14日）
6. 旅遊與文化（一）：旅遊人類學（2006年7月13日）
7. 旅遊與文化（二）：考察（2006年7月13日）
8. 當代宗教學理論（2006年7月17日）
9. 香港道教（2006年7月18日）
10. 宗教與生命教育（2006年7月19日）
11. 當代道教研究（2006年7月19日）

宮觀講學

1. 蓬瀛仙館之管理和行政架構（2006年7月21日）
2. 蓬瀛仙館之慈善服務與公益活動（2006年7月22日）
3. 蓬瀛仙館之人事及財務管理（2006年7月24日）
4. 蓬瀛仙館之科儀經緯（2006年7月25日）
5. 蓬瀛仙館之弘道及文化推廣活動（2006年7月26日）



道長訪港後感

覺悟與宏道

中國道教學院教師 崔理明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蓬瀛仙館聯合舉辦了「道教文化及管理暑期研修課程」，邀請中國道教學院歷屆畢業生和在校師生參加，學習參觀，並要求完成論文一篇。課程之外還有些零散的感受，願與同道分享。

（一）神與道、信與覺

第一個周末，去了淡水灣，那裏有一尊露天財神像，像並不大，但信眾極多。信眾排起長隊摸財神，希望能得些財氣。這讓我想起北京白雲觀春節廟會上信眾排幾里長隊摸石敢的情形；希望好運、六合逢候、風調雨順，這是百姓的祈望，也是神靈的希望。信心與神靈確實是有奇妙不測的力量，但有一點應當明白，只是相信神的力量，遠遠不是對大道的覺悟。神之所以為神，是由大道而生，神也必依道而行。相信神，當然與神很親近，覺悟大道則與神更親近，順道而行，所得利益更大。

當代人還是很喜歡這露天神像佛像，由於科技進步，盡可能造得世界第一大。我想仙佛在天上一定會竊笑。古代工具落後，這大的神像佛像，是要發誠心的，是用萬千人的財力，用數代人的畢生精力，才能完成的。造像的過程能使造像者自己的精神升華，也能讓禮敬者有感動覺悟。但是今天不同了，這個時代能震憾人心靈的東西不多了。

參觀活動中，蓬瀛仙館的道長為我們演示關燈燈花科儀，此科儀為香港所特有。演示中，科儀的每一節都有講解，並有幻燈說明。這一點很重要；它能使信眾對科儀

中所蘊含之道理有一個初步的認識，不至於不明不白地交錢辦事。中國道教協會張繼禹副會長赴港開會期間來仙館看望研修班學員，也一起觀摩了關燈燈花科儀，對科儀中的講解說明，頗為讚嘆。道教最根本的任務應當是增加信眾對道與德的覺悟。

廟院當然是個燒香敬神的地方，但更應該成為一所學校。這一點上，天主教、基督教、佛教都做得比較先進。基督教的信眾與唱詩班一起唱讚美詩，與牧師一起禱告——為自己、為別人，信眾直接參與宗教活動，這對於宗教非常重要。我們參訪了天主教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教堂內有千餘個聽經的座位。我們也參訪了志蓮淨苑，這是一座比丘尼修行的佛寺，其講經的臥佛堂也可容千人跪坐，而講法時，往往還不夠用，要在附近另一禮堂內同時得這影響。

（二）精神與物質

參觀了香港大學博物館，總監楊春棠先生向我們介紹了有關博物館的知識。博物館的職能是向人們提供資源和活動，以便於教育、研究以及觀賞人類的歷史文化和生態環境等。每一所道教宮觀其實都是一所博物館，它們歷史久遠，古蹟多，文物多，文



化傳統的影響更深遠，它們或處於青山綠水間，或處於歷史名城中。關鍵是要有這種主觀自覺，宮觀即是修道傳道、敬神喚香的地方，也是傳承文化、傳播美的所在。

午餐時楊先生提到：雖然是港大的博物館，但港大的學生未必都參觀過，還是科學館更熱鬧些。我認為，美和智慧的利益，是不能馬上見到的。的確，中國經過貪腐落後的時代，人們需要物質文明、科技進步；當代的全球一體化、國際的競爭，使得沒有哪個國家、地區敢放緩科技、經濟的發展速度。然而縱觀當代社會，眾多入關注的是物質，追求的是享受，終日拚命工作，扮演的角色只有二個——僱員和消費者，更有甚者為了貪慾，不惜以身試法，不惜損害他人和社會。親人間的仇視，國家種族間的戰爭，而這些都出於私慾，都是對大道的迷失。道教全真王重陽師在《立教十五論·第五論蓋造》中說：「只修外功，不修內行，如畫餅充飢，種雪為糧，虛勞努力，到了成空。有志之人，早當覓身中寶殿；體外未獲，不解修完，看看倒塌。」「早當覓身中寶殿」，即是我們人類精神的殿堂。物質世界的確不容忽視，但精神世界更不容忽視。

(三) 自度與度他

我們學習時，適逢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辦一年一度的書展，會場內有很多內地的出版社。讓人讚嘆的是：書展中很大很大一片是佛教、天主教、基督教的善書展位。我們了解到：香港明愛是天主教會在香港的社會服務組織，其2004-2005年度的支出是15,344,659港幣元。引導人

生覺悟，關懷社會苦難，讓人生啟。《易·繫辭上》：「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應者乎？」書展中道教有青松觀出版社，香港道教界也創辦道通天地的電視頻道、道教學院、圖書館，與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等大學合作進行道教文化研究活動，開辦學校、安老院，支持內地教育事業，還有賑災等慈善活動。《老子》八十一章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既以與人己愈多。」

內地道教恢復二十年來，也舉辦了各種文化與慈善活動，相信以後會更多更好。但還有很多事需要做，如修廟堂時能否建一個公共圖書館，以推動精神建設；能否與出版社、大學等合作出版老教授、老道长講授《老子》、《莊子》等道經道術的音像資料，讓更多的人能夠師法明師，解開迷惑，這些事是更急辦的，因為很多老教授、老道長年記已滿。

一個人或宗教如果只關心自身的存在，他是沒有希望的；相反，如果他始終關心原生的苦與樂、迷與覺，並不懈修練、努力，那麼，即使他還沒有大徹大悟，即使還很弱小，但卻大有希望。《老子》第七章說：「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又第四十三章說：「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行動是對大道最好的說明，也是對道教最好的宣傳。

所謂道感，都是不同時間、不同地點、對不同的人，對不同的事的感受，很散。但是，對一個修道者、一個宗教而言，凝而不散的核心理念是：覺悟與宏道，自覺與覺他。

為傳承點一炷心香

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龍沙公園關帝廟道長、中國道教學院坤道宮觀管理大專班學員 蔣理璇

斗轉星移，時光飛逝，自7月參加香港道教研修班以來，已歷4月，非常感謝香港蓬瀛仙館的寶貴饋贈。能有幸親得在港專家學者、高道大德的開示，亦算不枉此次香港之行，那風光旖旎卻又不乏玄妙古樸氣息的多利亞塔，彷彿能讓風塵僕僕的心靈沐浴一新。

我不知道道教文化在中華民族的腦海中殘留多少，只是很驚喜地發現，道教文化——曾影響着中國幾千年的文化歷程——在香港及內地正漸漸地被提升而不會被冷落和遺忘，使我不僅感覺到道教文化的經久魅力，而且也感覺到這種文化傳承熾熱。

傳承是使人類文明的延續和發展的重要環節。沒有傳承就談不上創新，沒有創新就談不上發展，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始創性、傳承性、創新性和發展性，道教亦不例外。

道教文化已有近兩千多年的歷

史，在其發展過程中既有繁榮鼎盛時期，也有衰敗低落時期，雖然歷盡滄桑，但道教的命脈卻從未中斷過，因為道教在其發展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適應社會，陶鑄了眾多的高道大德、中流砥柱之士，如北魏的寇謙之，南朝陸修靜等等，他們接續道脈，並不斷地注入新鮮養份，完善其教理教義，才使道教充滿旺盛的活力。「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事物的發展就是在傳承創新的變化中走向通達的。誠然，這種創新要應時適事，就如同一幅山水畫只有到大自然中才能進行創新一樣。

以舊創新是發展的通例。道教文化博大精深，僅僅一部五千言《道德經》就富含「修身治國」的深奧哲理，她雖然誕生於兩千多年以前，但至今卻仍不被塵封，可見其價值不僅體現在智慧深邃的老子本身，同時也體現在歷代高道大德、專家學者對其精湛哲理的深入挖掘以適應社會的發展，那些專家學者雖然與道教人員有所區別，但在傳承與弘揚道教文化上卻是相同的，因為他們總是走在時代的最前沿。

古人云：「小隱雖於山，大隱應於市」。人在山旁則為仙，傍山而居和山水融為一體，無不是每一位修道者、



文人墨客嚮往的閒適、寧靜的生活，但隨着社會的發展、人類的進步，現在已不存在消極過世的社會土壤，丘長春師爺在掌管天下道教之事時，曾倡導「立觀度人」，亦將龍門派的祖庭——長春觀，建於繁華的都市——燕京，而不是洞天福地也就不言而喻了。

繁華的香港，並存多種宗教文化，道教文化卻能游刃於其間而尤顯勃勃生機以利用這一方水土，其先進的科學管理方法和豐富的管理經驗，值得我們內地道親學習借鑒。由於香港與內地經濟發展水平的不同所造成的一種文化落差，必然形成一種動力，促使道教文化趨向高水平的發展，以此為契機，相信道教在文化的傳承上能更好地與國

際接軌，也必將迎來道教發展的中興之勢。

一個民族是不能否定本民族的傳統文化的，否則就無法屹立於世界之林，雖然沒有親眼目睹香港道教的发展歷程，但從其取得的成果可知高道大德們所付出的艱辛，身為道門學子，既在道門之下，有責任肩負起傳承道教文化的使命感、緊迫感，哪怕向前邁出小小的一步，若再加上無數個你，道教就會向前邁出一大步。

拜謁道祖，我為「傳承」點一炷心香，願此香徑達九天之上，繚繞於四維上下，過於寰宇，祈懇默佑；國泰民安。風調雨順。道觀永固。薪火相傳。

真道德 小大同

遼寧省瓦房店市龍華宮道長、中國道教學院學員 周智虛

丙戌夏月，我有幸參加了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蓬蘞仙館合辦的「道教文化與管理暑期研修課程」的學習，感受很多。香港道教給我們提供了另一種弘教的方式，讓我們的思想受到很大觸動和震撼，並從中獲得很多啟示。早就知道香港是東方之珠，物華天寶，當真正在其懷抱之中時，才體會到了它的魅力。香港，我們還會回來交流！

一下飛機，首先感到的是香港的繁華和香港人熱情周到的服務。蓬蘞仙館非常重視我們的學習活動，在生活上周到細緻。安排上充實豐富，交流上廣泛熱烈，從課堂學習到實地考察，從名勝觀光到街市購物，從安排飯食到關注健康，無不受到熱情的照顧，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在這裏，我以道門學子的身分，以兩岸「血濃於水」的情感為依託，向香港蓬蘞仙館的全體同仁、理事、道教文化研究中心的師生表示衷心的感謝，祝願兩岸道教蓬勃發展、共同發展，每個人都能沐浴在大道的光輝之中！

給人的感覺香港人素質很高，馬路上少有人隨意穿過，吃飯時少有人點一桌子的菜，有一次買東西，去的那家沒有，但該商家詳細地回答了我們的詢問，還給我們畫了路線圖，讓人很感動。而仙館的理事、館員都為了信仰獻身其中。平日，在仙館吃飯都得付錢，他們本着信道宏道獻身道教的信念，走到一起。香港道教界一心奉獻、全意宏揚道教的精神值得我們學習。

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香港道教更體現了這祖以慈為寶的思想，《道德經》第七十七章中有云：「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香港道教在慈善事業上投入很大，他們本着「齊同慈愛、異骨成親」的信念，以「有餘奉天下」的思想為原則，踐行着信仰者的「大愛」情懷。我們去青松觀參觀時，看見青松觀後面是安老院，老人三五散坐在院中，沐浴着夕陽的餘光，神態安詳，我們心中敬意油然而生。學習中了解到，香港宮觀每年收入30%全投入到慈善事業中去，而指豈為名傳世，處世常思利及人！潘偉俠先生在座談時說：「香港唯一值得學習的地方就是它的慈善事業。」誠斯言矣！



道教宮觀是思想傳播的載體，香港道教在宮觀管理上也有非常先進的理念，每個宮觀都有明確的價值觀，以服務大眾，造福社群為宗旨，並且能長期穩定地存在。管理上有計劃、執行、監察、檢討的良性循環，以確保權責平衡，各部門交叉制衡，並且處理事情上盡量透明及程序化，強調組織制度的重要性，尤其是五常法和檔案系統的管理，對我們有很大啟發。虛庵道長說過，這種集體管理方式，有時決策慢，有時不代表自己的真正想法，但能反映社會要求，代表大家的思想。仙館在管理上為了適應現代化，也在求「變」求「進」，提高自己，我們認識到，在現代化面前，固步自封是落後的原因！

社會瞬息萬變，管理上與時俱進，道教的傳播上也要適應現代發展的需要，現代社會的特色是物質主義擴張，現代人更多追求人與物質的關係。怎樣吸引更多的受益於教法呢？仙館做了很多嘗試，開創了宜道多元化的時期。仙館在「因事制宜」的無為思想指導下，借助先進信息手段，建立如道樂團、道教文化資料庫、「通通天地」電視台等宏道設施，更在每個星期天設有講經、誦經、養生等活動，靈活機動地傳播道教。反觀我們，我們的宏道工作更要有時代感，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應用現代手段傳播道教文化是時代要求。

潘偉俠先生座談時說：現代管理要時刻注意信仰成本，顧客是交易的，信徒是交心的，不僅弘揚道教文化，還要深入其中，像學游泳一樣，不能不下水。在內地，有些宮觀，其內修外行的功用在逐漸淡化，迷失於現實和功利之中，有世俗化傾向。香港的宮觀透明度很高，每年信眾的捐贈都有正確的用途，並公諸於眾。這樣信眾放心，宮觀與信眾有良性循環，才可以交心，否則拿什麼交心！人一旦功利心重了，便執於小法小術上，忽略了對大道的追求，便不重視對道學的研究，這何其不幸！所以有學者說：只有道教中每人都有爭當大師的念頭，道教才能振興。

通過二十天的學習，我們確獲了獲見，開拓了視野，思想深處受到了很大碰撞，我們決意以祖師弘教為榜樣，兩岸聯合起來，為宏道事業奉獻一生，再一次感謝中國道教學院、蓬蘞仙館和香港中文大學為我們提供了這個學習機會。

「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

會議紀要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吳真

由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辦、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華南研究中心協辦的「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於2006年9月16日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行。出席會議的學者分別來自中國大陸、香港和日本，共發表8篇論文。

2006年1月成立的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以推動廣東道教之學術研究為主要面向。鑒於近年學術界出現不少關於廣東道教史的研究成果，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乃決定以廣東道觀歷史為題，以區域道教史作為突破口，深入細緻地探討道教在中國地方社會的諸問題，並邀約同道共同參與，藉此推動廣東道教史研究。

近年學術界關於中國地方社會的宗教文化研究逐漸蓬勃，影響所及，研究中國地區道教的論著也相應增多。這些研究往往通過豐富的田野考察，描述地方商會的道壇儀式和道士活動，但較少涉及地方道教內部傳統、道觀與教派歷史及儀式傳承等道教專題研究。本次「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在道教地方傳統的研究廣度和深度上皆有新的開拓。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黎志添教授〈廣州三元宮的歷史——清代廣東全真道的發展與地方官員的關係〉以廣州著名的全真教龍門派道觀三元宮為個案，對今天仍是廣東地方道壇、道觀主流的全真教龍門派在清代初期南來廣東的歷史進行了追溯。她過三元宮的具體歷史考察成果，文章指出，清初廣東道觀紛紛轉投全真教龍門派的歷史因由，一方面固然是出於全真教龍門派道士在廣東傳播其教派的成果，但另一方面也與當時廣東地方官員貫徹執政者特意推崇道教龍門派的政策有密切的關係。

廣州中山大學歷史系王承文教授〈廣州五仙觀研究〉也以廣州現存道教宮觀歷史最為悠久的五仙觀為個案，運用7通五仙觀碑銘說明各個時代五仙觀與廣州民間社會的互動，進而探討道教在廣州1000多年的傳播發展史。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游宇安教授〈善業弘開的梅州黃化宮——從廣東到泰國道堂研究〉追溯了清末梅州呂帝廟到現時黃化宮近120多年的道觀發展史，以此一窺道教宮觀在廣東和東南亞華裔慈善與福利事業的宗教活動。論文指出，梅州呂帝廟在廣東道觀的獨特性在於道觀的重建和運作都與東南亞華僑有緊密關係，道觀與海外宗教團體互動的交流史將是廣東道觀史一個引人注目的面向。

日本茨城基督教大學文學部志賀市子教授〈「仙館」與近代嶺南道教〉追探近代嶺南地區以「仙館」為名的道教社區之分布、活動情況以及社會背景。指出仙館主要由文化精英階層的在家道教徒組成，仙館所進行的扶乩、行善、救劫、養生等道教活動對近代廣東道教影響殊深。

廣州中山大學哲學系博士生夏志前〈雲泉仙館與近代物南的祖信傳〉一文也以佛山西樵山雲泉仙館為中心，考察近代嶺南地區呂祖信仰狀況。夏先生從近年雲泉仙館的實地調查資料入手，圖文並茂地介紹了雲泉仙館近百年的道教活動。

廣州中山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所鍾東教授〈從碑刻資料看廣東道觀歷史的研究〉主要報告了正在進行的「廣東道觀碑刻資料彙編」計劃的部分研究成果。鍾教授指出廣



東道教宮觀碑銘銘錄著道觀與地方社會經濟活動的豐富社會資料，「廣東道觀碑刻資料彙編」的編輯出版無疑將豐富我們對廣東道教史的認識。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吳真博士〈關於唐代道士葉法善與廣東道教三個問題的辨析〉試圖從宋代讀書與廣東以外的文獻入手，鉤沉唐代廣州州道觀——龍興觀與著名高道葉法善之道教歷史，進而探討唐代邊遠的嶺南地區道教與宮廷道教內道場之間的關係。

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碩士研究生馬健行〈出遊之「道」：香港蓬瀛仙館與九龍城侯王出遊之研究〉以2005年3月香港蓬瀛仙館主持的九龍城「侯王出巡」儀式實地調查為個案，探討香港道教宮觀如何將道教儀式融入地區文化網絡之中。

研討會論文及會議期間的討論顯示了廣東道教研究結合歷史文獻與田野考察的研究特點。與會論文廣泛運用了正史以外金石資料中的道觀碑刻、宮觀志、山志，同時也留意到地方志中的藝文志、隱逸志等資料。在近現代道觀的個案研究中，研究者尤其重視實地田野考察和道觀道士與道眾的口述歷史記錄。這些材料的加入豐富了我們對廣東道教地方傳統的單向認識。

在宣讀論文之外，與會學者就廣東道觀的歷史源流（尤其是清代廣東龍門派道教歷史）、地方社會與道觀、「仙館」的文人化道教實踐、香港道教儀式特點等專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香港科技大學人文學部廖迪生教授、四川大學宗教研究所郭武教授也分別就專題進行了評點。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黎志添教授認為，地區道教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也有助於當代地方上的道教宮觀、道侶與道眾構築自我身分認同。

此次廣東道觀歷史研討會在內容和深度上，一方面展示了廣東道教研究與區域道教研究的學術前景，另一方面從研究對象與方法等角度來看，也為道教研究界探索了一些新的研究路徑，有助於我們從微觀史學的角度，更深入地進入到中國道教的內部結構，及其與地方社會關係的研究之中。據黎志添教授介紹，道教文化研究中心今後將繼續以廣東道教發展史為中心，展開各種學術研討。

王卡教授「道教文獻學的歷史回顧」講座報告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 吳真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學術講座系列第二講——「從一切道經到中華道藏：道教文獻學的歷史回顧」於2006年10月16日在崇基學院開講。本次演講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道教研究室主任王卡教授主講。

王卡教授首先回顧了自唐代以來歷代官方道藏編纂的歷史，同時也介紹了明清以來民間編輯道經的活動；他又條列出古佚道書、考古資料、敦煌道經、金石碑文、民間道書等8個方面的道教文獻整理研究，同時對明清以來道藏研究者著作及工具書進行了簡單的評點。王卡教授指出，《中華道藏》編修工程正是建立在這些道教文獻學的總結整理基礎上。歷時7年，經全國各地百多位學者共襄其舉的《中華道藏》已於2004年出版發行。作為《中華道藏》編審工作的主要負責人，王卡教授又費時3年，編成了第49冊《目錄索引》。在本次演講中，王卡教授重點介紹了《中華道藏》重新分類編排的體例、點校及版式特點，以及新編目錄索引在目錄方面對前人的突破。



活動報告

首屆「道教文化證書課程」 第二單元開課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與香港中文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合辦的首屆「道教文化證書課程」第一單元「道教概論」已於2006年11月3日順利完成。該單元由香港聖公會宗教教育中心研究部主任周惠賢博士主講，內容主要為道教創立、成長和演變的介紹；演變過程中面臨轉折或能積極發展的道教元素；香港道教的特色等。

13名學員中有部分來自蓬瀛仙館、省香真堂、飛龍洞佛道社、中華道教僑港道侶同濟會、雲鶴山房、袁康就太極內丹學會等6個道教團體，亦有部分學員沒有道教背景，惟他們對道教文化均有濃厚的興趣。

2006年11月11日道教文化證書課程第二單元「道教與養生」正式開課。該單元由袁康就太極內丹學會會長袁康就博士主講，旨在介紹道家養生理論及方法，並教導學員具體功法和安排實習。開課當天，袁博士先從氣文化的演變入手，講解其與道教千絲萬縷的關係。其後，他邀請各學員一同練習打坐，並再三叮囑預備功夫和收式功夫不可或缺。上課當日，各學員皆用心聆聽，認真練習。

道教文化證書課程分6個單元，包括道教概論、道教與養生、道教生死觀、道教與中國文化、香港道教與宮觀建築，及道教與中國藝術。本課程第一單元於本年9月初開課，第六單元預計於來年8月底完成，全課程為期約一年。



新書出版

《江南全真道教》

著者：吳亞魁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
出版年份：2006年11月
定價：港幣98元

道教文化研究中心學術叢刊 第一輯

《江南全真道教》上溯全真道教南行之始，下迄中華民國肇建，以宮觀的發展為主線，輔以與之相關的人（道士、道派）和事，依次敘述了有元以來640多年江南六府一州全真道教的源起和發展。其研究建立在大量可靠的史志資料、碑銘資料、筆記資料之上，考辨紮實，立論嚴謹，盡可能地復原了歷史的全貌。

吳亞魁，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系，後在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部學習，獲哲學碩士學位。1989至2001年，在上海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從事中國道教，特別是近代道教歷史和上海地方道教的研究。2001至2004年，在香港中文大學宗教系學習，獲哲學博士學位。主要著作有《生命的追求——陳摯華與近現代中國道教》、《當代中國宗教禁忌》之《道教禁忌》（合作）等。

查詢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地址：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學信和樓534室

電話：(852) 31634464

傳真：(852) 31634463

電郵：daoist@cuhk.edu.hk

網址：http://www.cuhk.edu.hk/crs/dao

通訊出版小組

編輯：黎志濠、游子安

編輯助理：黃啟安

設計/製作：文藝印刷設計有限公司

香港中文大學道教文化研究中心

（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所與道教蓬瀛仙館合辦）

版權所有，不得轉載

印刷數量：3,000份